

韩中人文交流的历史与课题

柳东春*

目 录

- 一、绪言
- 二、韩中建交前的交流
 - (一) 统一新罗以前
 - (二) 统一新罗、高丽、朝鲜王朝
 - (三) 大韩民国时期
- 三、韩中建交后的人文交流
 - (一) 金大中总统时期
 - (二) 卢武铉总统时期
 - (三) 李明博总统时期
 - (四) 朴槿惠总统时期
- 四、韩中人文交流的课题

一、绪言

1950年韩国战争爆发后，韩中两国间从此形成敌对关系，今年已经是两国结束敌对关系，开始新的交流的第21个年头。1992年建交后，韩中两国主要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扩大了交流，加强了相互间的关系。在经济领域，韩中贸易额在建交当时仅为63.7亿美元，而现在两国的年贸易额已达到2150亿美元，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指出，如果韩中两国签署FTA协议，那么2015年两国贸易额将有望突破3000亿美元。¹⁾ 在政治领域，两国关系的发展

* 西江大学中国文化专业教授

1) 2013年7月1日《일간스포츠》刊登，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摘要。

情况反映在相互协定中。建交后，1998年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发展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进一步升格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其他国家相比，这种速度的关系升级是极其罕见的。²⁾

随着经济和政治领域交流的不断扩大，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交流也自然逐渐发展起来，但两国国民间理解的深度未能得到保障，甚至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果解决不好，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就会成为两国关系长期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因此，现在不能再对其置若罔闻。为解决两国社会文化方面的矛盾和冲突，笔者将在本文回顾过去韩中两国间人文交流的历史，同时，为了扩大两国国民间理解的幅度，将对在哪些方面所需做出努力提出建议。

二、韩中建交前的交流

众所周知，中国和韩国交往的历史相当久远。但如果要谈到这种交流的具体证据，那就常常令我们不知如何以对了。因为相关的实证研究至今尚未取得相应的成果。相关研究之所以未能深入展开，主要是由于民族意识的介入，对方国家的研究成果很难得到认可。这样的问题应该在各界人士共同参与的场合下，互相就各自的研究成果交换意见，从而得出客观的结论，但目前，连这样的机会都少之又少。下面将对过去韩中两国建交以前的交往历史进行回顾。因为两国交往的历史十分悠久，所以本文以新罗统一三国和大韩民国政府的树立为界对这段时期进行划分。另外，新罗统一之前的交流情况主要以文献记载和反映考古学发现成果的实物资料为依据进行叙述。由于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的人文部分难以单独提取出来，所以本章中所涉及交流范围并不局限于人文交流。

2) 全圣兴，2010，第180页。

(一) 统一新罗以前

甲、历史记录

如果从公元前13世纪，周武王推翻殷商统治，箕子移居韩半岛算起，韩中两国交往的历史已有3000余年。在中国历史书籍上能看到很多这样的记载：

《史记》：“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³⁾

《汉书》：“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李义田蚕耕作。”⁴⁾

与上述两部历史书籍的记载不同，也有一些记载称箕子臣服周朝。

《尚书大传》：“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⁵⁾

与中国相比，韩国的记载在时间上落后许多，在朝鲜王朝刊行的韩国历史书籍上也能找到有关箕子前来朝鲜的记载，并且还将箕氏朝鲜作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三国遗事》：“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⁶⁾

《三国史记》：“海东有国家久矣，自箕子受封于周室，卫满僭号于汉初，年代绵邈，文字疏略，固莫得而详焉。”⁷⁾

当时，朝鲜学者普遍信奉性理学，并且慕华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自然不会对箕子朝鲜的实体表示质疑或是否定。然而，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和今西龙等首先开始质疑箕子朝鲜。日本学者们认为，“箕子东来说”是后世虚构的，即使箕子朝鲜确实存在，那它也是起源于中国的、中国人建立的国家，和朝鲜没有任何关系。⁸⁾

3) 《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1620页。

4)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第1658页。

5) 《尚书大传》卷三《洪范》，传三，四(第37页)。

6) 《三国遗事》卷一《纪异》第二古朝鲜条，第141页。

7) 《三国史记》卷二十九《年表上》，第395页。

8) 李相时，《檀君实史에 관한 文献考证》，高丽园，1990。

现在，韩国学界也大多并不认同箕子朝鲜的存在。有学者以出土的文物遗迹为依据否认箕子朝鲜的存在。他指出，中国的青铜器与辽宁省和韩半岛的青铜器样式不同，成分也有很大差异。箕子作为商朝的贵族，如果他成为朝鲜的王，那与商朝有关的青铜文物等应该出现在韩半岛，但实际的考古发现却表明，这两个地区的文化存在很大差异。⁹⁾ 另外，他还比较了不同时期文献史料的记载，指出，关于箕子朝鲜的文献中，先秦时代和汉代以后的记载有很大不同，因此他否认箕子朝鲜。也就是说，虽然先秦的《论语》，《尚书》和《竹书纪年》等古籍中能够找到关于箕子的记载，但并没有箕子东去朝鲜或受封于朝鲜的内容，而在汉代以后的记载中才开始出现箕子受封于朝鲜的内容。不仅如此，箕子向周武王提出《洪范九畴》的记载与箕子朝鲜的记载互相矛盾，这一点也为其否认箕子朝鲜提供了依据。¹⁰⁾ 现在的朝鲜学界普遍将箕子朝鲜视为虚构的历史，不予以承认。¹¹⁾

卫满继箕子之后出现在韩半岛历史中的第二个人物。战国之后，中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大批的流民逃往古朝鲜，古朝鲜接受了这些流民并将他们安置在西部地区。根据记载，秦汉两朝交替之际，燕王卢绾叛汉失败，逃亡匈奴，他的下属卫满率领1000余人越过东部的涘水，来到一个叫做上下障的地方定居。当时是古朝鲜最后一任王一准王时代，辽东太守封卫满为外臣，驻守边防。然而，后来他逐渐召集了大批真番朝鲜、燕国和齐国的流民，成为王，最后推翻准王，定都王俭城。此时是中国汉惠帝1年（公元前194年）。

《汉书》：“朝鲜王满，燕人。自始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涘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涘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在者王之，都王俭。”

9) 金贞培, 《所谓箕子朝鲜과 考古学上的 问题》, 《韩国民族文化的 起源》, 高丽大学出版部, 1973.

10) 李丙焄, 《箕子朝鲜의 政체와 所谓 기자팔조교에 대한 新고찰》, 《韩国古代史研究》, 博英社, 1976.

11) 허중호, 《고조선력사개관》, 도서출판 중심, 2001.

会孝惠、高后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以兵威财物侵略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¹²⁾¹³⁾

李丙焘认为，从上述记载中卫满从燕国来的时候“魑结蛮夷服”的句子，以及沿用朝鲜为国号的事实来看，卫满是朝鲜人的子孙。¹⁴⁾

但金翰奎指出，李丙焘提出的根据仅仅是能够证明卫满是朝鲜人的可能性中的一部分而已表明，并未表现出它的盖然性，卫满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这个问题不重要。当然，卫满和他的同伴也可能是“朝鲜血统的燕人”，但也有可能不是，如果仅凭盲目的推测就坚持卫满是朝鲜人的见解，那也许会被视作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¹⁵⁾

之后的交流情况在史书中也能够找到相关记载。考察《后汉书》和《三国志》等史籍中的记载可知，高句丽的官职名和官僚组织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

《后汉书》：“其置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邹大加、主簿、优台、使者、帛衣、先人。”

李贤注：“古邹大加，高骊掌宾客之官，如鸿臚也。”¹⁶⁾

《三国志》：“其国有王，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优台丞、使者、帛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级.....其置官，有对卢则不置沛者，有沛者则不置对卢。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称古雏加。涓奴部本国主，今虽不为王，适统大人，得称古雏加，亦得立宗庙，祠灵星、社稷。绝奴部世与王婚，加古雏之号。诸大加亦自置使者、帛衣、先人，名皆达于王，卿大夫之家臣，会同坐

12) 《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第3863-3864页。

13) 《三国遗事》卷一《纪异》第二魏满朝鲜条(第148页)中也引用了同样的内容，“燕王卢缩反入匈奴，燕人魏满亡命，聚党千余人，东走出塞。渡淇水，居秦故空地上，障，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俭。以兵威侵略其旁小邑，真番临屯 皆来服属，方数千里”，在两处省略了字句。

14) 震檀学会，1991，第257~258页。

15) 金翰奎，1999，第79页。

16)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第2813页。

起，不得与王家使者、帛衣、先人同列。”¹⁷⁾

据《后汉书》记载，韩半岛南部的辰韩人自称是秦国的后裔。

《后汉书》：“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¹⁸⁾

综合中国的史书记载来看，韩国的三国时期时，在高句丽已经有使用汉字记录的《留记》，五经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春秋》、《文选》等非常流行。而且，据说高句丽的太学以《玉篇》、《字篇》、《字林》等字书为教材教育贵族子弟。百济也建立了太学，教授儒家经典，百济的史书《书记》就是用汉字写成的。据说，新罗的国号蕴含着“德业日兴”、“网罗四方”的意思。¹⁹⁾

乙、实物资料

公元前10世纪前后，韩中文化圈的交流主要通过辽河西面的大凌河南部至庙岛列岛间的黄海海路，由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支石墓和稻种资料可知，两国间有人口迁移和生产技术的传入。²⁰⁾

公元前4世纪前后的反映两国交往历史的考古学资料有韩国西南地区出土的齐国桃氏剑，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考古学资料有明刀钱，公元前3世纪末以后韩国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交往事实通过燕下都贵族墓出土的细形铜戈和平壤出土的秦戈得到确认。综合这些资料来看，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3世纪初，韩中两国在韩半岛北部地区的交往以燕国的东进为契机，公元前2世纪末，汉四郡的设立起到重要的作用。

韩半岛南部地区与中国在文化物质方面的广泛交流是在公元前2世纪末汉四郡设立之后。与中国地区相比，两国间的交流大部分是通过汉郡县进行的。²¹⁾

17)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843页。

18) 《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第2819页。

19) 李英武，郝淑媛，2005，第90~91页。

20) 李清圭，2002，第125页。

(二) 统一新罗、高丽、朝鲜王朝

新罗与唐朝联合，统一了三国，之后，新罗便积极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艺术。政治制度方面，与唐朝一样，设六部和州、郡、县；在经济制度方面，效仿唐朝，实施丁田制、租庸调法和户籍制；教育制度方面也学习唐朝，设立国学，实行科举制。唐贞观中期至五代中期，新罗派遣2000余名留学生赴中国学习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典章礼仪、文学艺术和天文历法等。²²⁾ 韩国和中国史书上记载的在中国科举考试中及第的留学生有90多人，可以推测，通过他们，韩中两国的交流得以全面发展起来。神文王二年（682年），新罗设立国学机构，元圣王四年（788年），实行科举制度。

692年，新罗学者薛聪发明了用汉字部首、读音标记记录韩国语的“吏读”文字，新罗的文人用汉字创作散文、诗歌和小说。692年，孝昭王设医学博士职，开设医学堂，教授《本草》、《针经》、《脉经》、《明堂经》和《难经》。

高丽王朝与中国的宋、辽、金开展交流，962~992年的30年间，高丽26次派遣使臣入宋，宋朝也曾10次派遣使臣前往高丽。许多高丽留学生在宋朝的国子监学习。应高丽的要求，宋朝曾赠予高丽《大藏经》、各种儒家经典以及《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等典籍。958年，高丽开始实行科举制，922年，设立国子监，以儒学为中心，整顿教育和考试制度、取士方法。高丽成宗设修书院，有体系的刊印中国的经史书籍。1022年，宋真宗赠《乾兴历》与高丽，高丽王朝所收藏的一些中国古书善本，有很多在中国已经失传，因此，1091年，应宋哲宗要求，高丽宣宗将高丽所藏书目送往宋朝，共约有128种。²³⁾

元朝继续保持与高丽的友好关系，并在王室之间建立了婚姻关系。元朝公主嫁往高丽时，随行的官员和文人中有些一直生活在高丽，传播了中国文化。高丽的贵族子弟也前往元朝留学，他们中有些人曾参加元朝的科举考试。高

21) 李清圭，2002，第125~126页。

22) 李英武，郝淑媛，2005，第91页。

23) 黄有福，陈景富：《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转引自李英武，郝淑媛，2005，第91页。

丽学者还在元朝购买书籍。尤其是1314年，高丽中宣王在元朝购入“万卷书”，元朝还向高丽赠送了宋朝的秘阁旧藏书4371册。高丽王朝设立了国学机构成均馆，教授儒学，设立汉语都监教授中文。

朝鲜王朝与明清始终有着密切往来。朝鲜朝定期向明清派遣朝贡团，两国间通过朝贡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朝鲜朝派遣的朝贡团不仅在北京大量购买中国书籍，而且还结识中国文人学者，诗文唱和，进行交流。明朝赠予朝鲜朝很多典籍，朝鲜王朝搜集了明朝使节团和朝鲜文臣之间的唱酬诗文，编撰了《黄华集》。朝鲜王朝还翻刻、翻译了许多中国书籍。尤其是16世纪末的壬辰倭乱，对朝鲜朝和明朝的文化交流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壬辰倭乱”后，为了补充遗失的书籍，朝鲜王朝需要从中国大量购入书籍，因此中国的出版业也迎来了兴盛期，售出的书籍数目、种类众多。²⁴⁾ 两国的供需条件正好吻合。

1776年，朝鲜王朝宫内设立了奎章阁，收藏各种文献典籍。1778年，前往清朝的使节团在北京购买了《古今图书集成》5000余册，而且还购买了清朝的禁书。朝鲜朝的使臣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编成《燕行录》，极大地促进了韩中两国的交流。支配朝鲜朝思想界500多年的性理学逐步发展并形成完整的体系，其中，这种活跃的书籍交流便是其基础。

(三) 大韩民国时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韩国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解放出来，9月，以三八线为界，韩半岛被一分为二，形成对立的两个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和韩国各自形成持不同理念的阵营。此后，两国国民间的交流停止，东北亚地区的文化发展也受到阻碍。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局势的变化，两国间非政治领域的交流开始悄悄发展起来。

1978年，中国政府同意韩侨返韩探亲、访友和定居，同年，有一户韩侨4人返韩。紧接着，1979年，有2户家庭9人返韩，1980年，有23人返韩，1人以

24) 郭美善，2012，第71页。

探亲名义赴韩。1981年, 23人返韩, 2人探亲。1983年, 30人返韩, 70人回韩国探亲。²⁵⁾ 在这一年发生了韩中之间突破性事件。1983年5月5日一架搭乘96名乘客的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所属飞机被卓章仁等6人劫机了。²⁶⁾ 为了处理这一事件韩中两国放弃韩战以后的有限的消极接触, 而开始直接的交涉这次协商中正式启用两国的国号‘大韩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²⁷⁾ 从此事件以后, 两国开放了体育、文化、观光等非政治领域的交流。直至1984年, 韩中两国才全面允许本国国民的探亲访问。因而1984年2月韩国选手参加在中国召开的大维杯国际网球比赛; 同年4月中国篮球队到韩国来进行友谊赛。经过1986年的亚运会, 至1988年奥运会, 中国政府批准韩国企业家和游客来华, 之后, 两国国民间的往来开始增加, 1991年, 两国年出入境人数达到12000人。²⁸⁾

三、韩中建交后的人文交流

1992年8月24日, 韩中两国建立邦交关系, 重新恢复了1950年韩国战争后一度中断的关系。之后, 两国关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下面将考察建交后韩国历届总统在任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涉及到人文交流的内容。在建交当时的卢泰愚总统时期以及下一任的金泳三总统时期, 韩中交流主要侧重于经济领域, 因此找不到涉及人文交流的演讲文或联合声明。下面将从金大中总统时期的共同声明文开始论述。

(一) 金大中总统时期

为了加强两国间文化交流与合作, 双方同意, 定期召开“韩中文化联合委员

25) 高崇云:《中共与南北韩关系的研究》, 正中书局, 1989年, 转引自李晓光, 2006年, 第57~58页。

26) 1984年5月22日《东亚日报》刊登。

27) 1983年5月10日《东亚日报》刊登。

28) 1997年2月23日《环球时报》刊登, 转引自李晓光, 2006年, 第57~58页。

会”。《1998年11月13日 北京 韩中联合声明》

十、双方一致认为，为发展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不仅需要政府间的交流，也需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并扩大多种交流。

为加强和发展两国各方面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根据韩中两国政府文化协定，定期举行韩中文化联合委员会。

(二) 卢武铉总统时期

双方约定共同加强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同意将共同探讨每年举办“韩中交流节”的方案。

《2003年7月8日 北京 韩中联合声明》：

九、双方认为，“2002韩中交流年”活动取得成功，同意在此基础上对每年举办“韩中交流节”问题予以研究。加强两国文化交流及文化产业合作。

双方同意，进一步扩大两国教育、体育、新闻等领域和友好团体、青少年以及两国友好省市之间的交流，巩固两国人民友好合作的基础。

2年后，双方细化了交流范围，指定在文化、教育、旅游、体育和舆论等领域，由友好团体，自治机构间开展，为了扩大民间交流，增进理解，将2007年定为“韩中交流年”。

《2005年11月17日 首尔 韩中联合声明》：

六、双方同意，进一步扩大两国文化、教育、旅游、体育、新闻等领域和友好团体、友好省市等之间的交流，不断巩固两国人民友好合作的基础。

双方商定，将2007年即韩中建交15周年定为韩中交流年。两国政府将认真筹划、组织各种活动，使之成为进一步增进两国民间交流与理解的重要契机。

……双方积极评价两国文化联委会今年5月通过的《2005至2007年度韩中文

化交流计划》，同意根据该计划定期互派文化领域的专家、演艺人员及相关公务员，加强学术交流和文化产业合作。

（三）李明博总统时期

2008年8月26日，在韩中首脑会谈期间，胡锦涛主席和李明博总统同意将韩中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全面推进韩中交流与合作，两国专家和学者开展共同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交相关报告，2009年5月，第一期“韩中专家联合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该委员会由16位来自韩中两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的专家组成，经过一年的共同研究，于2010年4月向两国政府提交了《关于面向未来共同发展的“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报告》。该报告中提出了10项政策提案，其中有4项涉及人文方面的内容。

七、加强教育领域的合作；八、成立韩中历史文化联合研究委员会；九、两国媒体与网络间常设对话合作机制；十、成立“韩中交流合作基金”。

2011年4月，中国和韩国各自选出20名专家，成立了第二期“韩中专家联合研究委员会”，2012年6月，在第一期的10项提案的基础上，提交了第二期报告——《新视角下的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2年1月11日 北京 韩中联合舆论发表文》：

双方同意，共同办好韩中建交二十周年暨“韩中友好交流年”纪念活动，扩大青少年互访交流规模，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与友好感情。双方积极评价2010年“中国访问年”取得的成果，同意就2012年“韩国访问年”积极加强合作，进一步扩大人员交流。

（四）朴槿惠总统时期

2013年6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朴槿惠总统发表《韩中面向未来

联合声明》，同意为加强人文纽带，成立“韩中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作为政府间协调机构。另外，双方将加强教育、旅游、文化、艺术、体育等领域的多种交流。同时，双方将合作把以上领域的交流合作扩大至第三国。下面是联合声明中相关的内容。

2-1 重点推进领域

第三，促进两国国民间多种形式交流，积极推进加强两国人文纽带活动。为此，积极推进两国学术、青少年、地方、传统艺术等多种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进一步促进两国公共外交领域的合作和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由此，增进两国国民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夯实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2-2 具体行动计划

第三，为加强人文纽带，成立“韩中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作为政府间协调机构。委员会每年定期举行会议，确定有关交流合作项目，并指导其落实。加强教育、旅游、文化、艺术、体育等领域的多种交流，同时将合作把以上领域的交流合作扩大至国际舞台。

6月29日，朴槿惠总统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论及“亚洲悖论”，提出东北亚的历史和安全问题，并在演讲末尾再次强调人文交流。

《6月29日朴槿惠总统清华大学演讲文》

同学们，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亚洲。包括韩国和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如果在多方面加强互相合作的话，会产生更大的协同效果。但目前包括韩半岛在内的东北亚局势非常不稳定。域内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增加，但围绕着历史和安全问题的矛盾和互不信任，导致政治、安全合作仍然不足。

我提出这个称为“亚洲悖论”的现象，目前为了克服东北亚区域内国家间的这种现象，增进和平与合作，多边安全机制仍然缺失……

最后，中国和韩国的年轻人，希望今后通过文化和人文交流，使两国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也祝愿各位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四、韩中人文交流的课题

尽管韩中两国之间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但近来，两国国民间不友好的感情在逐渐增加。2001年的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中国人中，有43.6%对韩国人持好感，只有9.1%表示不喜欢，而对日本人，只有13%的受调查者表示持好感，61.5%表示讨厌。在接受调查的韩国人中，30%对中国人持好感，16%表示不喜欢，而对日本人，只有12%表示有好感，57%表示讨厌。²⁹⁾然而，2012年末至2013年初，英国BBC以全世界25个国家的2.6万人为对象，调查了对国际社会各国的评价。接受调查的中国人中，44%对韩国持肯定态度，28%持否定态度，对中国持肯定态度的韩国人占23%。对韩国持肯定态度的中国人所占比例虽然没有下降，但持否定态度的人增长了3倍。对中国人持肯定态度的韩国人所占比例减少了7%。值得注意的是，17%的中国人和21%的韩国人对日本持肯定态度。虽然对一个国家的好恶和对一国国民的好恶不能放在一起比较，但分析中日韩三国间这种好恶度的变化，便可以很容易判断，韩中两国间的关系与以前相比有所下滑。

期间，东北工程和高句丽历史论争等历史问题，以及文化遗产始祖问题等与政治、经济关系发展不同领域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过去地理上的邻近性使两国人民感到亲近，并由此使两国间多年来一直保持历史交流和文化同质性，而现在却开始起到相反的作用。就像男女之间的关系一样，开始相互喜欢，一旦分手后，就会更加讨厌对方。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呢？在思考解决方法前，需首先仔细分析造成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对于韩中两国国民间相互认识恶化的原因，全圣兴提出了三点；第一，韩国人对韩中形势逆转的不安；第二，微观、情绪层面上相互认识的问题；第三，强烈的民族主义冲突。³⁰⁾对于第一点韩中形势逆转

29) 李双龙：《中韩相互形象形成的背景剖析“韩流”与“汉潮”现象带给我们的启示》，《韩国研究论丛》第十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转引自袁小隍，张博，2007，第416页。

30) 全圣兴，2010，第189~191页。

问题，可以说，这在宏观层面、结构层面上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第二点表明两国国民未适应两国间关系的变化，第三点原因在民族意识强烈的两国国民，尤其是年轻人身上得到明显的体现。

金河林认为，两国的“国家-文化-意识形态”体系依然迥异，这种体系上的差异导致矛盾、冲突、偏见等问题不断。³¹⁾ 笔者认为，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些原因，那就是忽视两国差异的“理解和信赖的缺失”。以前，两国国民始终认为彼此在地理上、感情上十分相近，而一旦抛开这个角度，从远距离来看，那双方就开始感受到差异。曾经非常亲近的关系，一旦有了距离感，其影响会比本来就陌生的关系更甚。

实际上，中国和韩国虽然在地理上邻近，但存在许多差异。语言体系完全不同，以前，除了一部分使用汉字的知识阶层，两国人民间的沟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³²⁾ 不仅如此，虽然同处儒教文化圈，但日常生活中，两国间的不同之处也为数不少。中国和韩国的史书上往往注重刻画、描述共同点，认为差异不重要不予记载。在古时，韩国的知识分子十分仰慕中国，因此看重并强调中国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两国国民彼此间无法真正认识、理解彼此，只是十分表面的认为彼此相像。如果看到不同的一面，那自然就会体会到一种丧失和背叛的感觉。因此，为了两国间健全的关系发展，首先应该对彼此有准确的理解。为了理解彼此，需要先了解相互间的差异。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人文学者身上。³³⁾ 前面提到，“人文纽带”、“人文交流”等是近来才出现的，建交初期两国间的共同宣言和演讲文中，大多只是原则式的宣言。只是宽泛的陈述，没有明确的行动计划，宏观展现出来的只是表面的。当然，也并不是说这种不重要，只是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摒弃那种表面华丽的修辞，通过深入的省察和人文交流，找到能够使两国人民真正互相理解的具体方案。例如，过去，对经

31) 金河林，2013，第20页。

32) 事实上，即使汉字造诣很深的朝鲜知识阶层，用汉字写文章也常常存在困难。因此，除了公文，私人内容的文章使用韩文写作或韩文汉字并用。

33) 金河林（2013，第20页）指出，“克服过度的狭隘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本国优越主义等持续形成的这一体系，这是中韩两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人文学研究者的职责”。

典的共同研究可谓是两国的共同分母，这便可以作为其中一个方案。不必过于心急，要一点一点、有条不紊地、仔细地，耐心地来进行这项工作。由过去的经验可知，并不是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取得单纯量的增长就能使两国人民的感情发生质的变化。以真诚为基础的理解才能促进互信生根发芽。根扎的深，树才稳，同样的道理，只有以理解为基础，信赖才不会轻易被撼动。

參考文獻

1. 史書類

- 司馬遷(漢):《史記》, 中華書局, 1982年。
班固(漢):《漢書》, 中華書局, 1962年。
伏勝(漢):《尚書大傳》, 四部叢刊正編,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9年。
范曄(宋):《後漢書》, 中華書局, 1965年。
陳壽(晉):《三國志》, 中華書局, 1982年。
釋一然(高麗) 姜仁求 外: 譯注《三國遺事》, 以會文化社, 2002年
金富弼(高麗) 정구복 外: 역주《三國史記》,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出版部, 2011年

2. 論文、著作及其他

- 金貞培:《所謂箕子朝鮮과 考古學上的 問題》, 《韓國民族文化的 起源》, 高麗大學出版部, 1973年。
李丙焄:《箕子朝鮮의 政體와 所謂 기자팔조교에 대한 新고찰》, 《韓國古代史研究》, 博英社, 1976年。
李清圭:《한·중교류에 대한 고고학적 접근》, 《韓國古代史研究》第32輯, 2002年。
李英武, 郝淑媛:《古代中韓文化交流探析》, 《東北亞論壇》第14卷第5期, 2005年。
李曉光:《光復後至建交前的中韓文化交流探討》, 《長春師範學院學報》第25卷第1期, 2006年。
袁小琨, 張博:《推動中韓兩國交流的文化因素》, 武漢理工大學學報, 第20卷第3期, 2007年。
全聖興:《한국과 중국의 사회문화 분야 교류: 현황, 평가, 제언》, 《新亞細亞》第17卷第2號, 2010年。
郭美善:《中韓兩國的書籍交流考論》, 《語文學刊》2012年第10期, 2012年。

- 金河林：《한·중수교20년, 인문학 교류의 의미와 과제》，《韩中人文研究》第39辑，2013年。
- 李相时：《檀君实史에 관한 文献考证》，高丽园，1990年。
- 震檀学会：《역사가의 유향》，一潮阁，1991年。
- 金翰奎：《韩中关系史》1，ARCHE，1999年。
- 허종호：《고조선력사개관》，도서출판 중심，2001年。
- 한·중전문가공동연구위원회한국측위원회：《한·중전문가공동연구위원회백서：한중전략적 협력을 위한 공동 연구 활동》，世宗研究所中国研究센터，2010年。
- 한·중전문가공동연구위원회한국위원회：《한·중전문가공동연구위원회백서：새로운 차원의 한중 전략적 협력 동반자관계》，世宗研究所中国研究센터，2012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한·중수교20주년 한중간주요연설 및 문헌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
- 《한·중미래비전 공동성명》 出处：<http://news1.kr/articles/1195145>
- 朴槿惠대통령 清华大学 연설문 出处：
<http://news.naver.com/main/read.nhn?mode=LSD&mid=sec&sid1=100&oid=003&aid=0005234843>

Abstract

The history and Suggestions of humanities exchanges between Korea and China

Ryu, dongchoon

It has been 21 years since Korea and China have started making a new exchange after ceasing hostile relationship that has been created due to Korean War in 1950. After establishing a diplomatic tie in 1992,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en exchanging and expanding their relationship in economy and politics. Howeve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ublics of the countries seems to be stagnant, furthermore getting worse. This paradoxical phenomenon is a disturbing factor of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ies and therefore cannot be neglected anymore.

This manuscript will look back on exchange of humanities between Korea and China in order to solve this social and cultural conflict, and state an opinion on how we should act and which perspective we should take in order to expand the width of 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today.

Anyone will know that Korea and China have made an exchange from long time ago. However, not many people can point out a clear evidence of this exchange. Lack of accumulation of empirical study on this is the reason, which is due to stingy permission on each other's research results caused by national consciousness. Even though we should review research results and bring out an objective conclusion in a public sphere, the fact is that even a trial is a reckless attemp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tie in 1992, there exists many conflicts (not related to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hip), such as Northeast Project, dispute on history of Goguryeo and origin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he geographical nearness, long historical exchange and cultural homogeneity of the two countries, which made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ies have a sense of closeness in the past but now act as and adverse effect—just like lovers hating each other more after love.

Then how should we solve this problem? To find a solution, we must first carefully analyze the cause of this conflict. We have been mistaking Chinese as a very similar people to ourselves, and thought that we know them very well. In fact, even though Korea and China are adjacent to each other, there are numerous differences, such as the family of their languages.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we must first fully understand this differences. This is the duty of humanists. It is time we reject fancy but hollow exchange just like what we've done before and carry out practical solution which can help us truly understand each other by deep consideration and humanities exchange. The joint research of Confucian scriptures, which is a thing in common of two countries in past, can take place. There is no need to hurry. We should carry out the solution step by step with patience.

Key words : humanities exchange, Confucian scriptures, cultural conflict, differences, consideration

투 고 일 : 2014. 1. 10. / 심 사 일 : 2014. 1. 20. ~ 2014.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4. 2. 20.